

论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

刘贵田 著

红旗出版社

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刘贵田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刘贵田著。—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5. 5

ISBN 7-80068-773-2

I. 论… II. 刘… III. 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A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4734号

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编者著 刘贵田
责任编辑 曹勇进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吴明

红旗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25印张 160千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7.80元

ISBN 7-80068-773-2/D·26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中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影响。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完备而严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许多基本原理和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想；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思想；关于建立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关于建立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坚持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

目 录

前言	(1)
一、实事求是	(1)
(一) 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	(3)
1. 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3)
2. 实事求是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11)
3. 实事求是思想的曲折发展	(18)
4. 实事求是思想的新篇章	(23)
(二) 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	(34)
1. 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35)
2. 实事求是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37)
3. 实事求是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联结	(42)
(三)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45)
1.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45)
2.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核 心	(52)
3. 实事求是党的根本经验、根本路线和根本作风	(54)
(四)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57)
1.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	(57)
2. 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66)
3. 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必备的素质	(69)
二、群众路线	(76)
(一) 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发展	(78)

一、实事求是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结合的根本体现，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多方面丰富内容中的活的灵魂，即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从一开始就主张实事求是，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在《共产党宣言》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中，他们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②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③1885年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①在谈到未来社会的特征的时候，恩格斯又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②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③又说：“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④他还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⑤列宁不仅强调无产阶级的策略要以事实为基础，而且对事实的概念作了确切的规定：事实不是随意罗列的实例，而是事实的全部总和。他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⑥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命题，它高度体现了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266—267页。

⑤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7页。

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就其内容而言，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又是中国式的。

“实事求是”本来是一句古语，出自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一语。唐朝的颜师古注解：“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本意是说，献王刘德在研究学问中注意掌握事实根据，从实有其事中做出真实结论。“实事求是”一语是后世人们治学的一则著名格言，通常指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其含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无关系。毛泽东善于古为今用，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并把它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给这句古语注入了新的内容，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

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斗争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概括和解释以及它的思想内容的不断充实发展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1. 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重视中国的国情，把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作为他们思考问题和努力奋斗的出发点。1920年毛泽东就曾说过：“吾人如果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中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在党的幼年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已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这些可贵的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文献中，体现在当时一些共产党人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已经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端，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立即召开了“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着各地武装起义的爆发，中国革命进入创建红军和发动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党领导武装起义和发动土地革命战争，同样遇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下，在“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盛行起来。1928年下半年以来，红四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也比较严重。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对待外国革命的经验，对待中共“六大”的决议。他们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中共六大是于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针对当时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经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大会作了正确的结论，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六大的缺点是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就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特别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而这些工作是毛泽东当时已经做了，六大存在的问题后来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实践上加以解决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但是六大是全党的代表大会，六大的“本本”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六大的“本本”原来就有缺点，拿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贯彻执行，更有一个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盲从六大的“本本”，“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①他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111—112页。

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提出了不唯上，要唯实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①

对六大的“本本”的态度，直接牵涉到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六大是直接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六大召开之前斯大林曾和中共几个负责人谈了话，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都参加了大会的实际工作，布哈林还在大会上做了长达9个小时的报告。六大的“本本”是瞿秋白起草的，但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特别是布哈林的报告有着重大影响。他在报告中，不但没有肯定中国共产党为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积极探索，反而批评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地方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在这种情形下，一些长期从事城市工作，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某些中央委员，都按布哈林的调子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不重视城市工作。不少中央委员的发言都强调革命的“主要力量仍表现在城市”，因此，党在城市的工作“应占重要地位”。与此相反的意见，在布哈林作大会的结论报告中受到批评，这就把刚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途径给否定了。

六大以后，在中央领导下，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应给予充分估计。然而直到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始终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1929年12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111页即111页，卷1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斗争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一次议案的起草工作，这个重要文件，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案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在这里，毛泽东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客观形势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思想和政治高度，不仅如此，还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这个期间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1930年1月，他写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毛泽东指出，党内一些领导人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之所以认识不足，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以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

村工作为中心的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一个飞跃，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然而，毛泽东上述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被党中央所接受。1929年10月，共产国际仍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①。到了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中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但仍然强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立意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②。这些指示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但是党内的一些人都把它视为金科玉律，并据此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1930年4月3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具体要求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证武汉的胜利”，并批评毛泽东在赣闽粤三省边界地区建立红色政权的主张是“割据政策”、“保守观念”。同年5月，《红旗》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4月有人在《红旗》发表文章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6月，中共中央在决议中更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毛泽东针对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他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教育党员干部要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第1930年10月。

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指出，一事当前，不去调查它的实际情况，“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他还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就将反对教条主义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它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并把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强调为了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创造斗争的新局面，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以调查研究为中心，并把调查研究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反对本本主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从而在我党历史上首次自觉地提出了以调查研究为特色的思想路线。虽然文章中没有用实事求是这样的文字来概括，但上述内容实际上表明这一思想已初步形成。

但是，可惜的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和他在实践中所代表的正确方向，不但没有被主观唯心主义笼罩的中共中央所承认，反而遭到责难。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写信给红四军前委，

批评毛泽东“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是“农民意识”，^①是“不了解现在革命形势”，“还固执过去的路线”。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后，甚至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讥为“狭隘经验论”而加以指责，并被错误地批评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反而受到批评。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会议着重分析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推行一套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单纯防御路线”。指出这条错误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完全相反的”。遵义会议通过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这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由错误走向正确的转折。即由“左”倾教条主义，照抄照搬马列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转到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全党开始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周围并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胜利道路前进。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结合对“左”倾关门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指出“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1936年12月，毛泽东为了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6册，第139页。

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从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入手，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毛泽东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他抓住了“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的关键问题，批驳了刻板地照抄苏联红军和北伐战争经验的两种错误意见。指出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在这里毛泽东把指挥和实行战争的过程，看成是从客观实际和“实事”出发探索战争固有规律的过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示和总结了指导战争的方法。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依据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科学的总结、彻底揭露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其错误的哲学认识论根源，从而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之上。毛泽东指出，中共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而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总之，“两论”从哲学上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党内“左”右倾错误作了透彻的批判，对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以哲学理论的概括，这表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2. 实事求是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如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等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形成到最后在全党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一样，实事求是思想路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4页。

线从形成到在全党的确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方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并首次使用“实事求是”概念。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中，鼓励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青年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同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指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为了坚持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③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并且指出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我党获得“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④。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是因为他们不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② 同上，第522—523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